

在跨文化语境中对理论的反思

——元理论浅探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
这个时代一样被理论所充
斥”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1996年物理学家苏卡尔(Alan Sokal) 在学术季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 #46/47期)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 题为“超越界线: 通往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诠释”。这篇文章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主要是因为文章的意图, 并非它那荒谬的内容。如今所谓的“苏尔卡恶作剧”实际上就是对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戏仿。苏卡尔在炮制该论文时引用了许多著名学者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证, 并且在读者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揭露了学术界里滥用伪科学术语的欺诈行径。苏卡尔在他后来与布里克蒙 (Jean Bricmont) 於九七年合著的〈知识分子的欺诈〉¹ (Intellectual Impostures) 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指出好几位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学者, 例如拉康 (Jacques Lacan), 博德里拉(Jean Baudrillard) 等人在一般非科学家的读者前, 像皇帝的新衣中那样搬弄科学术语, 全然不顾它们的相关性甚至其真正含义。这篇文章在学术界, 尤其是法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一些在书中被揭发的学者如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 则谴责此书两位作者简直是患有“畏法症”² (Francophobes)。

人们大可不必理会 这些争论而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严肃的课题上, 但我认为, 当我们讨论跨文化语境中的理论这个题目时, 至少有一个原因值得我们对这个事件加以关注。这就是: 袭用科学术语或理论术语未必会带来更多的意义, 相反, 许多今天被视为先锋的理论, 细究之下可能只是一番废话。

让我用一个“文学理论”中的例子加以说明: “转喻中无可决定的系统性话语再现某种非原始欲望的隐性拉康式的反移情。” (This discourse of metonymically undecidable systematicity re-enacts a certain crypto-Lacanian countertransference of non-originary desire.) 倘若你认为 这个句子颇为冗长拗口, 那么接下来的句子只有更加复杂: “以阐释学方法使非地方化的范畴化拒斥任何新巴赫金主义的复调狂欢对话的话语。” (The hermeneutically deprovincialized categorization resists any discourse of neo-Bakhtinian dialogism of the polyphonic carnivalesque.) 如果你现在隐约觉得以上的句子是一派胡言时, 你可能是对的。(我以绝对谨慎的态度提出这个假设) 且不管这些句子有无意义 —这是按一定的句型模式把信手拈出的当代理论术语中的单词和短语排列成的句子, 即所谓“速成文学理论” (Instant Literary Theory)。这些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文件是免费的

¹ 法文版: *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 (Paris 97), 英文版, *Intellectual Impostures* (London 98), 其中包括苏卡尔的原作。

² Jean Bricmont and Alan Sokal, “What is all the fuss about?”, *TLS*, Oct. 17, 1997, p.17; internet version: “The Furor over *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

“学术社区服务”。文件的匿名作者建议我们(万一我们仍然对句子的含义耿耿于怀)要记住：“意义源自观者的理解”³。

这也显示出了本题中有趣的一面。暂且先把它搁在一旁，因为我要把注意力引向以下一些极普遍却容易让人忘记的概念，首先，所有理论都是和潮流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的。貌似高级文化(*haute culture*)的东西到头来更像高级时装(*haute couture*)⁴，即一种受漂浮不定的潮流所左右的格调。其次，我想审视一下某种文化的时髦理论被运用到另一文化背景时产生的悖论及讽刺意味。换言之，我想追问，绝大部分属于西方思想结晶的社会理论及文化理论之普遍适用性。

我深知这样的冥思——我不大敢称之为“元理论”(metatheory)——极可能含有深层次的哲学内涵，对此，持怀疑精神的哲学家们都曾有过表述——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概念等等。我本人并非一位专业哲学家，在准备加入这可能非常深奥的讨论之际，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局限。最后一点是有关不受理论支配的范围存在与否这个问题——张隆溪在一篇和本题相关的颇有见地的文章中，对该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⁵因此，干脆模仿维特根斯坦和庄子的样子，对此沉默，也许更明智些。

(一)

Dietrich Schwanitz 最近不无挑战性地指出，西方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已进入垂死阶段，其地位由“世界观”取而代之。⁶且不谈西方宗教是否真的已经死亡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其实，公认为死去者往往活得最久，从单一视角对世界何去何从所作的整体性解释，作为“主义”在现代时期中猛增，而这些世界观之中至微的一般共同特征似乎就是“理论”⁷。在(如今愈来愈全球化的)被需求、趋势及时尚控制的意识形态市场上，这些理论在角逐竞争。换句话说，虽然人们宣称“主义”与理论乃是追求客观与科学之知识成果，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它们的创始人、追随者，乃至接受者都活动在受历史阶段、文化背景及地域限制的公共空间之中。简言之，它们均受制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

³ 见注解。

⁴ 同上。

⁵ 譬如，卡尔波·波博(Karl Popper)1939年在他的指明方向的重要著作《<<Die Logik der Forschung>> (研究的逻辑)及其1959年的英文版《<<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科学探索的逻辑)》中指出，由于理论总不能得以充分证明，哪怕仅从一个相悖的观察角度出发都会导致篡改。由此，他指出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区别在于：“科学理论虽然不可查证，但经得起考验。于波博而言，科学与非科学的检验标准是该理论是否可被篡改。”(Scientific theories are testable though not provable, and so the demarcation criterion between scientific and non-scientific theory for Popper is whether or not the theory is falsifiable.)

(http://www.vusst.hr/ENCYCLOPAEDIA/popper_and_the_philosophy_of_edu.htm上的探讨)

有鉴于此，后现代时期的主要新理论，例如后结构主义及其所谓的文化理论可被看作非科学理论。下文中“理论”这一术语几乎都特指该种理论。

⁶ Zhang Longxi,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in Zhang Longxi, *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1998, p. 125. 其实在我起了草稿之后才发现，张隆溪这精彩文集的每一篇文章或多或少都和本文论题有关，观点颇有见地。

⁷ Dietrich Schwanitz, *Bildung - Alles was man wissen muss* [Education/Cultivation - Everything that One Needs to Know], Frankfurt 1999, p. 345.

⁷ 同上。

此外，理论也有其生命周期(life-cycle)，有其兴衰之时；因此，皈依某种理论、使它得以兴盛纯属时间的安排：你可能正在打先锋，但也可能正在撤退中。譬如，只不过在几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及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组合(如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曾是欧洲学界宠爱的意识形态。在它盛行期间，阶级差别、阶级意识、俄底浦斯情结、嫉妒阴茎(penis-envy)以及阉割(castration)(被理解为社会化)统统属于意识形态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倘若有人今天试图为它们辩护，听众顶多会一笑了之。我们不是先知也可以料见，再过这么长的时间，同样的命运会降临于今天的热门话题头上，诸如解构、性别差异与从属概念等。

理论的历史局限也意味着，事后我们稍微觉得明智一些也许我们其间意识到，先前笃信的东西竟是毫无意义。让我以一个非宗教领域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众所周知，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后的七十年代初，西欧知识分子中的先锋派视毛泽东的中国为期望中的乐土，并且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伟大的成就。几位具影响力的法国学者如前文已提过的克莉丝蒂娃及巴特(Roland Barthes)，甚至福柯(Michel Foucault)特别明显地把毛泽东的中国理想化。在他们七十年代初的文章中(还有克莉丝蒂娃与巴特均担任编委的先锋期刊*Tel quel*)文化大革命被视为“他们政治乌托邦最完美的实现”⁸。Lisa Lowe 举例说明，克莉丝蒂娃试图推翻她眼中的西方父权制度，她在1974年所著的《中国女人》(Des Chinoises)一书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源自前俄底浦斯的母权制社会”⁹。她假设中国在前儒家制度时期经历过母权制，然后轻轻地跃过三四千年的历史，将所谓母权制直接当作文化大革命的前身，她认为文革带来了男女平等。除此之外，克莉丝蒂娃甚至还发现了中国表意文字的某些意识形态优点。其观点不过是质疑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的回声：

中国文字的逻辑(视觉再现、姿态标记等等)(先见)取决于母系的社会—自然统一体，缺乏事物系统与符号系统的清晰区分，具有无意识冲动的优势。¹⁰

不消说，这种中国文字是“原初‘第一符号’的前俄底浦斯符号的混融”，“尚未分离连体的母—子”¹¹，从属于原始的母权制，而且使我们相信，是一种交往的“更好的世界”——正如Mary Erbaugh在一篇富有洞见的文章中所概括的，比较而言，“西方”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神论、父权制和逻辑的单纯语言的交往”¹²。在这里，她不仅

⁸ Ing-Britt Trankell, "Orientalism and Anthropology in Asian Studies", internet version.

⁹ Lisa Lowe,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1991, p. 137.

¹⁰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l. Anita Barrows. New York 1977, p. 55-56; quoted in Mary S. Erbaugh, "Ideograph as Other in Poststructuralist Literary Theory", in: Mary Erbaugh (ed.), *Difficult Charact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riting*, Columbus 2002, p. 209.

¹¹ Kristeva, p. 30-31; Erbaugh, p. 208.

¹² Erbaugh, p. 208. 参考德里达(Derrida)对其影响。艾尔堡认为，后结构主义者的语言观有如下特点：“Alphabetic writing, the poststructuralists charge, built the despotic Western state, unparalleled in slavery, bureaucracy, and imperialism” (p. 206). (后结构主义者指控字母文字无比地以奴隶制，官僚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形式建立了西方暴政。) “Mislabelling spok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s ‘nonphonetic’, poststructuralists lump them together as a silent poetic Other” (p. 207). (后结构主义者误释汉语口语及日语为‘拼字与发音不相似’，而将两者概括为静的诗意另类。) 德里达就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及符号中心主义)之观点参阅其著作《<<Of Grammatology>>》(表意符号学)，英文版译者嘎亚春·斯宾瓦克(Gayatri Spivak)，巴尔的摩(Baltimore)，1976(1967)。有关对其观点的评论，参见张隆溪的《<<The

把几千年前后的时代混为一谈，而且还对不相干的文化因素作了比较：“把儒家思想、封建主义与[西方的]一神教、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而以西方圣人反衬中国小妾。”¹³克莉丝蒂娃作为彼时(及今日)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在这大幅度的跨历史和跨文化的精心构思中，唤来并糅合了70年代公认的关键理论精华——拉康式的心理分析、符号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却在仅仅25年之后失去了它的说服力。

无独有偶，巴特在他的《*Alors la Chine?*》(1975)一书中也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导致西方“阴茎中心”主义的社会制度瓦解的女性母系空间。¹⁴中国给他提供了拉康式的前语言幻想空间，先于“阉割”、社会化和父亲的干涉 (intervention of the Father)。¹⁵”——我们若对该观点宽厚处理，也许还会发觉其有趣之处。Lisa Lowe 运用当今主流术语和范畴来把这些法国先锋派知识分子的越轨行为归纳为“后殖民东方主义” (postcolonial orientalism)。这种东方主义不是采用殖民方式来霸占他国，而是通过乌托邦理想。无论此类分析 (包括多元性、本质主义、隶属概念以及有关后现代术语) 是如何地被证明是正确的，最使我诧异的，不是因为领导潮流的学者理论家们会犯错 (他们毕竟是凡人，而凡人——用歌德<浮士德>中上帝的话来说——“只要进取，就会犯错”)，而是他们受时尚所约束。换句话说，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使他们炮制谬论 (fallacies)。(也许在此文中拼成“phallacies”更恰当些)。

理论拥有它的生命循环；然而还有另一个也和理论有关却多半未获注意的循环：由批评转为肯定的循环。大部分理论始于批判盛行理论或阐释体系，往往会连带引入过去未受瞩目的新观点。当它在意识形态或理论市场上取得成功时，也就是，当它把对手淘汰掉时，一度有批判性的理论就会开始为现实辩护，从异端挑战者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为正统的卫道士。要为一个新(或旧)理论做出辩护的策略是宣称该理论附从者具有正确意识，同时指控其偏离者的意识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理论都声称发现其他理论的隐秘结构和局限性。因此，如 Schwanitz 所言，理论游戏是按照这套准则进行的：“我所看见在背后主宰你思维结构的，正是你自己所看不见的”¹⁶。而今“错误意识”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意义上(或意识形态上)的不正确，如“天赋论”(nativism)、“本质论”(essentialism)、“民粹主义”(populism)等类，或者以不同的“恐惧症”的面目出现，像前文已提过的“畏法症”(Francophobes)等等。

(二)

让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我们题目中的跨文化维度。所提的问题是，当某些理论，特别是那些由一定的文化取向所决定、有着历史局限的理论，被输入挪用到另外的文化背景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从历史角度看来，这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今天的理论与主义的前身，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学、马

Tao and the Logos -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道与符号—文学新严密学，东方与西方)，达勒姆 (Durham), 1992。

¹³ Lowe, p. 151.

¹⁴ Lowe, p. 139.

¹⁵ 同上。

¹⁶ Schwanitz, p. 347

克思主义之类等宗教和重要世界观，都曾流传世界各地并且广为接受。¹⁷ 然而这一进程取决于某些特定的促进因素；它也具有一些颇为吊诡的后果从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所有这些都还有待深入探讨。

跨文化的理论接受过程，首先取决于外来文化与现存的有助于接受它的观念或实践的相容性。比如，中国接受印度佛教得益于中国已有类似的思维脉络：道家；这两者渗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即俗称中的日本佛教禅宗（这也是一个成功的跨文化接受的例证）。同样地，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有赖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共同之处（如关心公共福利和《礼记·礼运》中设想的大同。第二个促进跨文化接受的因素是文化相遇时和特定历史背景下对某种理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用上面提到的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例子来阐明：当佛教传入中国时，正值国家分裂、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佛教不但为遭难的百姓提供慰藉，而且还对人生问题，如人类的痛苦作出意味深长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是，19世纪的中国早已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情况之下，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以解决帝国主义带来的问题显然最得人心，因为这套理论给屈辱的中国人解释了为何败在欧洲强权下的原因，这一解释合乎他们的需要，能够抚慰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最后一点是，现代主义（包括伪现代主义）在八、九十年代引进中国时，正值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中国逐渐对外开放并脱离一元论的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中的主体观念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观念在中国盛行起来是不足为奇的。对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不均称关系的认知，唤醒了后现代主义的敏感性，比如人们希望后殖民时代的“中国特质”（Chineseness）可以成为西方霸权的对立面。

理论和“主义”被移植到另一个文化环境后会起些什么变化？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运用一种理论时，通常会根据新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这样往往会导致理论偏离甚至“扭曲”本来的思想。上述有关佛教的例子已经显示出佛教如何在进入中国后逐渐形成自成一格的禅宗，在日本（和西方国家）被称为Zen。当耶稣会教士于17世纪在中国传教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融入当地习俗。由于中国传统中缺少基本的基督教概念（如具有人身、受苦受难的上帝概念，还有面包与红酒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来说，饭与茶也许会更恰当些），一些富有创意的传教士（如利玛窦及其追随者），成功地——虽然是昙花一现地——把基督教教义融入新的文化环境。¹⁸

至于断章取义地挪用和转化理论的事件可在五四时期(1919)略见一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任意地自西方理论名单中挑选出合意的主义，完全忽视这些主义

¹⁷ 我们可以在这里作出以下的区别：虽然所有主要宗教都假设普遍实用性的存在，但是有一些则尤其热忱、使命式地展示这一点，最明显的是西方宗教。因此，从长久历史与个别的环境因素这方面考虑起来，西方人会最自然不过地设想他们的政治理论、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天生本就具有普遍实用性。西方现代性中的首个俗世宗教，马克思主义，肯定含有这个看法。它自称是个“国际主义”和一门客观、历史性/经济的科学。当理论涉及某些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学之类时，宣称拥有普遍性是更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理论，即使它们具有普遍实用性，却经常显示出对事物带有排他性的观点。

¹⁸ 同时，他们也开始对中国思想体系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成为中国思想在欧洲的传递者。基于他们非传统的异质文化观和本土化传教方式跟梵蒂冈教条有所出入，这个早期的跨文化认识在“礼仪之争”中以失败告终。

各自的历史或社会背景及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较量中获胜。原为国际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却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用来保疆卫国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马克思主义渐渐变得面目全非了，它中国化了，和原本的学说大相径庭。再看一个近的例子：西方对禅宗的接受。美国垮掉的一代(American Beat Generation)把禅视为标新立异的生活风格，与西方个人主义相呼应¹⁹，甚至把禅运用在诸如摩托车维修方式²⁰、踢踏舞、和后现代哲学诀窍²¹之中。道家在西方国家的遭遇也差不多：在失去基督教取向的西方，道和禅用来作为宗教替代品，人们的兴趣很快集中在(并非西方而已的)欲望上：如“钱之道”和“性之道”！虽然这些例子只能粗略地把主流时代精神勾画出来，但是也告诉我们，跨文化的理论接受(为前文所述的世界观前身)往往表现为误解，或者可以模棱两可地称那为有创意性的误解。这些新产物有其自身规律，这是无可指责的，需要指出的一点只是，以批判性视角出发，人们应该意识到本来的思想仅仅作为变体——用句音乐术语就是“主题变奏”——继续存在，而且往往服务于有违其本意的目的。

此外还有个时间滞差的问题。²² 基于漫长的翻译和普及过程，西方理论要在非西方文化中立足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我本人曾在北美生活过五年，我发现风靡美国的时尚一般五年之后才会在欧洲大陆流行。至于中国，虽然有许多接受美国价值观念的留美学生的努力，但基于翻译上的困难，与美国流行的时尚仍然存在可观的时差。譬如，八十年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主体性”(刘再复)在中国大受瞩目之际，“后现代主义”早已渗透入西方社会的每一个生活层面²³，“主体”——至少在学术界里——早被德里达等人解构了。因此，无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如何积极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新的西方理论，它们还是会落在后头接受过时的热门话题。吸取马克思主义亦然(其实佛教也是在印度衰弱数百年后才为中国所接受的)：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满以为他们引进了揭露西方弊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新的西方思想体系，却在几乎一个世纪后才醒觉，事过境迁，只有他们还守着在19世纪条件下解释世界的模式。²⁴ 今天，这是没人要的旧货了。看看近来中国的“后学”热(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主义)，“后学”两字似可译为“[西方]屁股后面之学”。于是，一心要赶上西方最新的“主义”使中国人注定永远落在西方后头面对耻辱。

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谨慎地对待任何大理论或世界观所宣称的普遍有效性。特别是在跨文化的理论调整过程中，所宣称的普遍有效性并未得到证实，而往往表现为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¹⁹ 参阅Umberto Eco 的文章,“Zen and the West”(著于1959), 刊发于其 *The Open Work* 一书中, Cambridge, Mass. 1989.

²⁰ Robert M. Pirsig,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New York 1974.

²¹ Carl Olson, *Zen and the Art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Two Paths of Liberation from Representational Mode of Thinking*, New York 2000.

²² 也参阅张隆溪, 143ff.

²³ Joseph Netoli and Linda Hutcheon, *A Postmodern Reader*, Albany 1993, quoted in Michelle Tokarczyk, “Postmodernism: No Longer Useful?” (a review of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Theory & Event* 1:4, internet version.

²⁴ 另一个可以凸现历史矛盾与讽刺的例子是由欧洲移民在美国发起的自由主义。他们离开欧洲的压制，在美国宣布个人自由、摆脱殖民主义的故国，而仅仅是为了自己在整个美洲大陆进行殖民，且不说还引入了奴隶制。这一历史的讽刺几乎未受注意，因为鉴于美国今天的全球权势，再也没有人关心这遥远的过去；因此，美国土族是现今美国社会中最被忽略的少数民族。

让我们也看看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先看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吧，它与马克思主义及爱因斯坦相对论曾是20世纪西方思想的基石，现在它的地位已经动摇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神话在好长一段时间后才被破除，因为它长期牢牢地主宰了西方学术分子的思维方式，为他们提供打破几乎所有西方传统禁忌的参考框架(进而成为象征性取向)。²⁵但是今天似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作为“科学”尝试的现实有效性；连现今的心理学学生也不过是把弗洛伊德理论当作学科内的历史部分来看待，更不要谈它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了。常识告诉我们，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恋母情结和所有其他的理论，在非欧洲人家庭里如中国人家庭里是派不上用场的，更别忘了希腊神话中的象征关联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弗罗姆(Erich Fromm)是第一个提出弗洛伊德思想受特殊文化限制的学者，对它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提出置疑。纪念他2000年100岁诞辰时，他的见解也同样地受到注意。如今人们至多只能把弗洛伊德理论与19世纪末维也纳社会扯上关系。如果说这一理论以拉康精神分析的面目仍行于世，那也仅仅是作为尚未解构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大叙述”中的一种而已。

(三)

既然理论是历史构架中的一部分，它就不仅影响政治领域，反过来也受政治影响。过去几十年源自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理论，多数都对西方思想与传统持批判态度。换言之，批评现代成就一直就是现代性的焦点所在。²⁶ 特别是最近的文化理论都具有高度政治性，由于它们非常强调一些西方现代性中的基本论题，如个人自由和平等，结果导致彻底的多元论、对权力的批判、等级的取消。让我们看一下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例子。这些观念在后工业多元文化的个性化的西方自由社会中(美国作为现代性范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些摧毁(以基督教为本的)西方社会秩序的先驱思想家后，继之又有福柯、拉康和德里达这后现代理论家。按照他们的规则，后现代游戏的目的是揭示并解构权力的等级制度(却由此忽视了批判权力总是含有对权力的兴趣)。

另一个政治因素是意识形态市场上各种理论的激烈竞争。甚至连近来自称为具有客观方法的“科学”的“社会学”也如此。但是该领域内的彻底多元论却导致后来被称为“专家两难”(expert dilemma)的现象的出现，即每一个由“科学性”、“客观性”和理论性所支持的立场均可被拥有同等“科学”重量却完全相反方向的立场取代。比如议会修改法律听取专家们的证词时，这一两难处境表现得很明显。²⁷ 政治上或意识形态的取向，即倾向性，是最终影响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因素。客观性看来徒有其名，只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的多元化而已。

²⁵ 七十年代初，它还引发了打破恋童禁忌的运动。1977年，一份公开的呼吁书要求废除法国有关“勾引未成年者”的法律，内称：“儿童和少年拥有与自己所选择的对象发生性关系的权利。”萨特、西蒙·德·波娃、傅科、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在这份呼吁书上签了字。

²⁶ Leszek Kolakowski, *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²⁷ Ulrich Schnabel, “Das Expertendilemma - Viele Debatten werden mit widerspruechlichen Gutachten gefuehrt. Was folgt daraus fuer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专家两难 — 许多争议是借助相互矛盾的专业鉴定进行的。从中对科学和政治可以引出什么结论?) DIE ZEIT, 25 (June 15, 2000)

当西方以外的(大抵既不是后工业化的,也没有个性自由或多元文化的)国家如中国吸取西方理论时,会出现种种有趣的内在张力和矛盾。这些观念以一方面用来批评中国现存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也可用来研究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霸权话语”。然而吊诡的是,批判西方观念和制度的西方理论,对外用来反对西方影响(洋排外主义),对内则用来挑战国内的权力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欧美理论同时(其实一开始就)被用来审视西方追求的理想(譬如“主体性”)。如果“后学”热在中国会持续下去,那么观察这一张力朝什么方向发展,肯定会非常有趣。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在中国盛行的后现代理论源自当年福柯对毛主义的钟情。²⁸

另一个支配时下理论争论的政治因素是全球化。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不是一个文化中立的演进,更多西化甚至美国化,因为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深受美国金融、商业和娱乐业的影响。美金、微软视窗、CNN、好莱坞电影、电视喜剧、Jerry Springer、马多娜和杰克逊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美国本是一个拥有狂热传教精神传统的国家,对它的传教热情来说,自由贸易、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一句话,美国道路已成了宗教替代品。²⁹

在全球化(意指国界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好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其一是大量的非西方——如中国——学生和学者涌向国外学习西方,以便日后以其所学为祖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类似五四时期的情况。可是许多甚至大部分学生都没有重返祖国。他们宁愿在国外、比方说在斯坦福或耶鲁,而不是在国内做专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在文化领域发展,他们不仅在英文也在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把西方观点和理论引介到中国。由于海外中国学者大都对国内的政治环境都持批评态度,因而他们的声音被西方媒介视为真正或地道的中国声音。这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去不去定论。由于我有许多朋友和同事属于这个群体,因此我不想对该情形发表更多意见,但我想至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本真的声音?换句话来问:在这国界崩溃,文化交融的全球化世界里,至少在西方半球里,还有什么可称为本真的呢?本真性是现代西方的观念,是与主体(或主体性)概念同生同更的,但后者已被后现代理论家们驳倒了。13亿中国人住在中国大陆,还有可能高达一亿的中国人分布在别的地方,究竟什么是本真的中国样式呢?我无法回答,只想把它保留为一个问题。

此外,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或亚洲人和非洲人)通常都会欧美化。他们逐渐地偏好西方事物,并且接受西方观点和基本需求。反之,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也会同样地开始接受当地观念、习俗和喜好。甚至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至20世纪初叶著名的中国经典德语翻译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也如此。后者以新教的传教士身份在中国逗留了大约20年后,却沾沾自喜地表示从来没给任何一个中国人洗过礼。反过来,他倒把中国思想引入德国(通过由他翻译荣格作序的德文版《易经》,再被译成英语传到美国去)。汉学家和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会因专业关系自然而然地偏爱中国事物,他们肯定愿意看到中国人更多地注重自己的文化资源。据杜维明的定义,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虽然

²⁸ 郭健,“文革思潮与‘后学’”,刊发于《二十一世纪》,35(1996年),116页;也参阅张隆溪,138页,207页。

²⁹ William Pfaff,“In America, Radical Globalizers Talk Like Missionari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9, 1998.

在最边缘的外层。³⁰ 他们的态度仅仅是可口可乐殖民化(Coca-colonization)时代浪漫化的文化怀旧吗？

让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西方理论在中国接受过程。大致上这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至五四时期的第一阶段中，人们仰慕西方理论，并且不加鉴别地把这些认作中国的新标准。当时正值西方的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鼎盛时期，除了马克思和尼采的批评外，西方思想在西方未受到多少质疑。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盛行的期间。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对西方传统批判最为激烈的——西方理论被广为接受，而其它的思想体系则统统被归入错误的，亦即资产阶级的观念。在第三阶段的八、九十年代期间，中国掀起了“后学热”，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理论又被推崇接受。与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似乎已对自己的传统和力量丧失了信心，因此时髦理论大都抨击西方观点和制度，解构作为“宏大叙事”的自己的成就。今天的情况和五四时期颇为相似：被称为先锋的兼批判西方思想的理论(如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又再次获得中国人的青睐。

目前，以文化研究之类形式出现的先锋理论——后结构主义主宰了美国学术界，其影响不限于在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其中多为中国人）而波及全球。Mary Erbaugh探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知识界的吸引力，认为“起作用的多半是取悦西方论文导师的愿望”。她发现，中国知识界吸收新的话语规则（国内外）而“用时兴的强势理论武装”自己，再次像五四时期一样去“破坏偶像”。正如Erbaugh所指出的，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时尚”是“西方对优越的中国文化和文字的确认”，这是后结构主义的“延异”理论提供给中国行家的。³¹

上述观察中国“后学热”最大的历史讽刺是：刚刚摆脱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中国人不仅获得民族自尊心，而且还意识到集体自性，他们在打破旧传统主张(从五四运动至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弘扬残存的中国文化，最后发现“主体性”可以替代毛主义的一元论。可是所谓的先进西方理论却偏偏在这时告诉中国人，民族性(nationhood)这个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按照美国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范型，自性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普遍的世俗化信仰时代，只以某种解释的文化区别，将会有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之嫌。某个对立的理论则建议文化概念只是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性别上或其它方面的)偏好或取向；尽管主体性广为流行，主体概念，尤其在后结构主义文本阅读中，早已过时了。

(四)

我们对接受别文化圈的理论时衍生的问题进行了观察，这些观察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当然，不管是告诫中国人必须采取西方最新的理论，还是反过来奉劝他们把西方的那一套抛在脑后而开出自己的道路，两种态度都是文化上的

³⁰ 杜维明,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120/1991.

³¹ Erbaugh, p. 213-214.

傲慢。当然，从我们的道路中发现有趣的东西是他们的权利，正如我们汉学家也可从或不从中国的事物中寻找刺激。我想说的是，如何回应从西方潮水般涌来的现代或后现代理论、意识形态和“主义”，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早已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他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接触到西方概念就援引有限的西方理论知识相互攻讦的态度大背景下，胡适实用而稳健的忠告是妥当的，虽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在马克思主义统治的中国（直到今日）是不正确的。但是既然今天中国共产党打出“实事求是”的口号并乐意采取实用的态度，胡适的思想可能会重新评价。

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与西方进行真诚的文化对话。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跨文化对话实际上并不对称，中国知识分子相当熟悉西方文明的基础，反之却不然。一位非洲人所做的以下的评估，对中国(和东亚)知识分子也是合适的：

哪个欧洲人有资格自誉(或抱怨)，他也像成千上万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学习另一个“传统”社会时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³²

再说，跨文化间的对话通常都是以英语进行，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对话的结果。支配语言也意味着支配交际手段，包括作为整个人类交际重要部分的文化象征取向。此外，“对话”通常是在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看来这个持续不平衡的格局正是沟通中国与西方隔阂的障碍。西方也有一些主张文化间或跨文化间对话的活跃分子——根据他们的普遍主义信念——把对话当作消除文化区别的办法，把区别消除得越快越好。但是文化间际的对话不应理解为由一方(学生)接受另一方(老师)的意见。对话应该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增进彼此间的理解。

因此，我们如果要防止今后全球化变成纯粹西化，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平衡东西和南北关系。导致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如英语的优势以及基本上可以视为美国传教努力的全球化)已在上文提过了。就以中国而言，它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时下全球的辩论中占一要席。并非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理论不感兴趣，在我看来，更多地是当今中国确实没有任何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值得由汉学家或中国学生介绍到西方的。由此，在时刻关心全球发展之际，中国人应以新颖手法坚守他们的立场，这不仅会给无知的西方人提供——创造性诠释过的——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而且还为纯粹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讨论增添了个全新的维度，从而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目前，大部分西方理论，比如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由于致力于语言及文字研究，极有选择地选择中文文本，通常只关注“最短但最模棱两可的文体：抒情诗、毛泽东语录及《道德经》”。然而，正如玛丽·艾尔堡总结的那样，当人们只剩“毛”“与‘道’可以经常引用时，众多潜在的宝贵的中国理论影响也好，艺术界也好，就都被封闭了，既看不见，又听不见了。因此，中国文化遗产似乎是被一和为了一时髦的西方理论拼配了。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中国思想可以也应该像其他区域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至海德格尔)作为普遍的参照系。其实，西方现代思想就是对一个悠长而内容丰富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因此现代西方理论家会自然不过地在他们的论述中参照这些，而他们对欧洲以外的思想史毫无概念。但是中国色彩应该不仅仅限于中国传统，也要包括以批判态度积极加

³² Ahmed Baba Miské, *Lettre ouverte aux elites du Tiers-Monde*, Paris 1981, p. 143.

入理论讨论，挑战西方盛行的观点。当然这也可包括创造性地诠释(或误释)吸取西方思想。放长眼光来看，说不定中国会演绎出一种调谐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的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过上一个世纪左右不仅在西方作为一种天启，如禅宗作为中国思想在多种文化交汇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备受称誉。

最后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我并不坚持必须采用它——以道家的态度，静观西方各种理论的潮水逝去。赫尔德(1744-1803)早已在他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认为，“设想世界各地的居民都必须像欧洲人一样才会生活得快乐乃是妄自尊大。”讨论文学并不必非得醉心于诸如尼采、福柯或德里达不可，过有意义的生活更是为此。人们可以投身于严肃的事务或者以游艺自娱，不必听二手理论家的建议。这，George Steiner在他1989年的《实际的存在》(Real Presences)书中就曾力荐过。此外，有必要指出，很多的“后学”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指导；它更多地似乎是指向自我的语言游戏，或者说为话语的话语，并带有某种自我矛盾的特征。因此，后学尽管有大人物环伺护驾，也会停顿下来，因它唯一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揭露(亦即解构)自身。

现实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比我们对它的理解和关于它的理论要快。我们理解世界和世界趋势的尝试总会有时间滞差。留下来的充其量只是指涉时过境迁的事物和情况的文字。从这个视角来看，哪一个解释世界的尝试和方法(包括此文在内)又不是知识分子的欺诈呢？当理解可能只是误解的另一种形式，而解译充其量不过是创意性的误译时，那么人们可以质疑任何宣称找到对事物的“正确”看法的正当性。³³就像醉心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学和“易”的哲学的现代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在其[克依纳先生的故事](1955)中所写的一句并非与理论问题毫无关的话：有人问K先生：“你在做些什么？”K先生回答：“我在努力准备下一个错误。”

³³ 我记得多年前读过大概是古德曼(Paul Goodman)这样的一句话：“但愿上帝使我远离单一的看法——以及牛顿的睡乡。”

Appendix:

This came through on the ESPAN-L list...do you have it already?

Caveat emptor: The author of this text cannot accept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using this document, including but by no means limited to public lectures,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research grants and fellowships, and any and all decisions regarding academic hiring, promotion, and tenure.

INSTANT LITERARY THEORY

Instructions: Select at random one item from each column below and combine grammatically to position yourself on the cutting edg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Try paradigms E-F A-D B-C and A-B-C D A-B-C. And, if you're worried about making sense, just remember:

"Meaning" is in the interpretant of the beholder.

N.B. The word "discourse" does not appear in any of the columns below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t is a required component of every statement. Its position within the sentence, however, is completely flexible.

e.g. "This discourse of metonymically undecidable systematicity re-enacts a certain crypto-Lacanian countertransference of non-originary desire."

OR: "The hermeneutically deprovincialized categorization resists any discourse of neo-Bakhtinian dialogism of the polyphonic carnivalesque."

A	B
latently	deconstructive
intrinsically	postmodernist
narratologically	undecidable
pervasively	referential
archetypically	marginalized
conventionally	phallogocentric
strategically	transferential
implicitly	localized
metonymically	heterogeneous
manifestly	essentialist
equivocally	deprovincialized
diachronically	paralinguistic
metaphysically	hierarchical
covertly	gynocritical
self-consciously	displaced
negatively	transformational
subversively	recidivist
nascently	legitimizing
synchronically	antithetical
hermeneutically	sophisticated

C	D	E
ambiguation	resists	crypto-
mimesis	reflects	neo-
intertextuality	re-inscribes	proto-
systematicity	recovers	post-
patriarchal order	recreates	quasi-
formalism	re-introduces	meta-
diegesis	refutes	sub-
ontology	repositions	anti-
phenomenology	retraces	macro-
categorization	reconceptualizes	pseudo-
counter-narrative	re-articulates	super-
actantial model	reifies	retro-
contextualization	reconstructs	infra-
juxtapositioning	reverses	pre-
dialectic	re-enacts	ultra-
discontinuity	restores	auto-
orientation	recalls	
teleology	reinforces	
indeterminacy	replicates	
differing and deferring	retrieves	

F

Austinian opposition of the constative and performative
 Bakhtinian dialogism of the polyphonic carnivalesque
 Barthesian "jouissance" in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scriptible"
 (no, no, Cartesian jouissance!--Judy)
 Derridean invocation of an underlying generalized absence
 Econian exploration of sign-function in a global semantic system
 Foucauldian archeo-genealogy of the cultural "episteme"
 Freudian allegory of repressed psychosexual domination
 Greimasian deep structure of "enonce-spectacle"
 (You mean there's no Hegelian/Husserlian/Heideggerian goodies?--Judy)
 Jakobsonian network of distinctive-feature interstices
 Kristevian elaboration of the pre-oedipal in the "avant-garde"
 Lacanian countertransference of non-originary desire
 Levi-Straussian competence of homology by "bricolage"
 Marxist critique of the disguised ideological hegemony
 Peircean trichotomy of semiotic mediation
 Saussurean framework of "langue" and "parole"
 Shklovskian emphasis on the defamiliarizing "ostranenie"

The above document is 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 as a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Your own ethical obligation will vary with actual mileage, viz. scholars making their careers
 from it perhaps ought to contact the author regarding royalties.